

现有公司治理制度不适应市场化改革大势

■ 李志辉

万科股权之争不断演化,表明现有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已难以适应市场化改革形势。一方面,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给予保险机构极大的自主配置资产空间。相应地,保险资金更多参与资本市场,出现了纷纷举牌上市公司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因自身治理结构的缺陷,无法有效应对股权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保险资金举牌上市公司源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2012年开始,保监会推进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断放宽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给保险机构市场化配置资产提供了空间。在保险资金可投资范围扩大的同时,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所形成的“资产荒”格局却使保险资金投资主体陷入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恰逢去年资本市场异常波动导致股票估值普遍低于合理水平,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的热情不断高涨,举牌上市公司的行为不绝如缕。保险机构举牌上市公司,不仅反映了监管转型所释放的资产配置需求,而且是“资产荒”背景下保险机构追求资产端收益的必然选择。

其次,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大股东地位是公司控制权的基础。然而,公司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往往会引入外部资本,这导致股权结构分散化,并对原来的控制权归属形成挑战。因此,如何在引入外部资本与追求稳定的公司控制权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关键。现实中,为维护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



权,存在一些制度安排。比如,阿里巴巴集团管理层通过合伙人制度,以 10%左右的持股比例实现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在该制度安排下,合伙人团队拥有提名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的权利。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创始人任正非持有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仅 1.4%,但拥有公司决策的一票否决权。本质上,这些制度安排是“同股不同权”的体现。

但是,万科缺乏这类用于维护管理层控制权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华润作为第一大股东几乎不干涉万科经营管理,这为管理层获取公司控制权与经营自主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是万科能取得如此成绩不容忽视的因素。只是,这种将控制权寄希望于大股

东支持,而不依赖股东地位来获取的安排缺乏长期稳定性,一旦股权结构或大股东态度变化,公司控制权可能会随之转移。在宝能成为第一大股东后,万科管理层积极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希望借此由深圳地铁取代宝能的地位,从侧面反映出管理层对失去控制权的担忧。

最后,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机制不完善,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响应,中小投资者在获取信息上处于劣势,其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信息的披露程度。万科股权之争,中小投资者所获取的信息并不充分,且相关各方争论不断演化,大超市场预期。中小投资者根本无法充分了解相关各方

真实的利益诉求,难以合理判断万科未来的投资价值。从他们的角度看,只有万科正常持续经营,才能提供稳定投资回报,而这有赖于公司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成员的相对稳定。况且,万科稳健经营也符合宝能与华润的长期利益。但是,从宝能提出罢免万科董事监事的议案来看,中小投资者的这一诉求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笔者由此认为,只有保持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与市场化改革相协同,才能使类似万科股权之争的事件得到根本解决。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相关各方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均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上市公司治理不完善从微观层面反映出资本市场的法治化水平仍有待提升。在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下,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的外在约束力不足,致使市场约束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万科独立董事投票、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引发的争议,都对市场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笔者建议,短期内,各方应从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出发,加强沟通,妥善解决彼此利益诉求,推动事件向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与符合股东长期利益的方向迈进。而中长期内,应加快市场法治化建设步伐,推动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避免类似万科股权之争事件的发生,促进资本市场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系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统计学专家：改革 GDP 核算方法不是为了保增长

7月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改革研发支出核算方法、修订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公告。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我国各年 GDP 总量有所增加,其中 2015 年 GDP 总量增加 8798 亿元,增加幅度为 1.30%。数千亿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整?如何理解本次 GDP 数据修订?GDP 调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此,新华网联合《中国信息报》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院长宋旭光。

新华网:为什么要调整研发支出核算方法?

宋旭光:研发支出是指为了增加知识储备系统性从事创造性工作而支出的价值。这种支出的发生,主要是为了增加知识存量,它通常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以知识产权产品的形态出现。通常情况下,此类知识产权产品一经生产便可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与其他物质资本共同作用,生产出其他货物和服务。知识产权产品可被长期持有并在生产活动中持续发挥作用,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从这方面来看,研发活动所形成的生产成果与厂房、机械设备等有着同样的属性,均为固定资产。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固定资产形成的概念可知,用于知识这种固定资产积累的支出也应被视为固定资产形成,因此,研发支出理应资本化。

纵观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各个版本,可知此次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更非突发奇想。SNA1993 承认进行研发活动的目的在于改进效率或提高生产率,因此,研发活动是一种投资性活动并非消费性活动。但由于当时的核算方法不够成熟,SNA1993 不得不将研发支出作为中间消耗处理,在此情况下,研发支出没有被资本化。

而随着国民经济核算技术的发展,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时机逐渐成熟,最新的 2008 年版的 SNA 修订了原有的核算方法,明确

将能够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产形成处理,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研发支出核算方法的变革。自 SNA2008 推出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芬兰等国相继采用新的国际标准,截至 2016 年 1 月,已至少有 39 个国家(地区)按照 SNA2008 的要求,将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产形成处理,并据此调整了有关 GDP 数据。以美国为例,2012 年,研发支出调整就使美国经济总量增加了 2.5 个百分点。

新华网:有人认为,GDP 数据一经发布,就不应再调整了,您怎么看?

宋旭光:其实不然。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基础资料或核算方法发生较大变化时,必须对有关数据进行修订。例如,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在发布初步核算数后,还要进行五次修订。我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发布后,也要进行两次修订,我国还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全面修订。另外,当核算方法改变时(比如本次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也要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修订。可见,对 GDP 的科学调整是完全必要的。

新华网:有一种看法认为,本次 GDP 数据调整是为了保增长?

宋旭光:有人认为,本次 GDP 数据调整是为了使经济总量增多一些,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这也是一种误解。GDP 数据调整不仅是调整当前数据,也要根据历史数据调整其他年度数据。通常,相邻年度调整的幅度是相近的。因此,从增长率上看,数据调整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本次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我国各年 GDP 相应增加,但 GDP 增长速度变化不大。尽管 2015 年 GDP 总量增幅达 1.3%;但扣除价格影响后,2015 年 GDP 实际增长速度仅提高了 0.04 个百分点。显然,数据调整是一项技术性工作,没有也达



不到“保增长”的目的。

新华网:GDP 数据调整是国家的事情,似乎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关联不太大?

宋旭光:这更是一种误解。当今社会,统计数据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准确、及时的统计数据不仅能服务国家决策,也对企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对于国家来说,数据调整使得国家能更准确地评估经济形势,制定更好的政策,从而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其次,对于企业来说,研发支出计入 GDP 使企业研发活动得到更多的认可,有利于加快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最后,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为了更好地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也要关注有关数据变化。

新华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本次 GDP 修订?

宋旭光:首先,GDP 数据的修订有利于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核算框架和统计方法逐渐与国际接轨,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本次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使我国进一步缩小了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差距,对于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高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其次,有利于真实反映经济情况。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改变,新经济形态大量涌现,研发活动重要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此次修订可以更好地反映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引导研发投入,推进创新发展。同时,研发支出核算方法的调整也相应地使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略有提高,第一、第三产业占比略有下降。这些变化有助于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结构的真实状况。

最后,有利于其他重要修订陆续推进。国民经济核算修订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完成研发支出核算方法调整后,有关新经济、金融创新等的核算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居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方法也应与国际标准接轨。应当在本次 GDP 修订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有关核算方法改革,及时修订有关统计数据。

总之,数据修订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应正确理解 GDP 研发支出核算方法调整的现实意义,让修订后的数据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

(据新华网)

打造“六型”党员 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 阎斌

95 年来,我们党通过不断学习推动了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先进性的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是基层党建必须认真探讨的课题。面对这一课题,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只有打造融“学习型、安全型、责任型、创新型、服务型、廉洁型”为一体的“六型”党员先进群体,才能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智力支持。

打造学习型党员。就国有企业而言,面对严峻形势的考验、安全生产的考验、和谐稳定的考验,必须通过新的学习不断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前锋模范作用,才能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为此,国有企业打造学习型党员,必须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企业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中取得前六名

好成绩;通过函授、自学达到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在工人技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中,工作成绩突出、业务能力显著,被评为工人技师、首席技师,晋升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时,在学习中要克服“赶时髦”、“无言论”的错误认识和畏难情绪;重点解决政治化、口号化、文体化、表象化、僵硬化等倾向性问题。强调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及本体性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渗透,从而使学习知识、追求发展、自我完善成为党员的自觉要求,营造“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良好氛围。

打造安全型党员。国有企业必须以实现“安全第一、违章为零、事故为零”为目标定位,共产党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产第二”的安全理念,在岗位区域安全联责、职工安全及出勤联保活动中,所在小组实现安全生产;每月至少排查三条安全隐患、提出一条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受到单位及企业表彰;在抢险、救灾、救护方面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及时避免重大损失;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达到服务零距离、质量零缺陷、安全零事故。形成“安全示范看党员、隐患处理有党员、遵章守

纪数党员”的良好氛围。

打造责任型党员。事业心、责任感,是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的重要思想保证。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党员事业心责任感的增强。党员肩负着“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的重担,能否出色地完成企业党组织所赋予的重任,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决定性因素。为此,国有企业打造责任型党员,必须深刻把握“责任意识,是‘想干事’;责任能力,是‘能干事’;责任行为,是‘真干事’;责任制度,是‘可干事’;责任成果,是‘干成事’”的真正内涵,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以“企业兴亡”为己任,立足岗位、敬业奉献,敢于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树立和谐心态,用感恩的心对待工作忠于企业、忠于他人;将履职尽责作为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在讲责任上看行动、在树正气上做表率、在干事业上抓落实、在比贡献上争一流。

打造创新型党员。生产工艺的改进,生产设备的改造,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应用等都依赖于党员先进性的发挥。国有企业打造创新型党员,必须进一步明确“创新就是要

创前进路上未涉足的‘新区’;政策上不能到位的‘盲区’;矛盾交织中的‘灾区’;思想工作中的‘误区’”的真正内涵。在理论、管理、技术、制度四大创新中,其理论创新成果获企业以上奖励或发表在市级以上报刊上;其实践创新成果获企业以上奖励;“五小”创新成果、“QC”小组创新成果受企业以上部门表彰奖励的;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应用方面做到人人有建树。

打造服务型党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改革发展成果与人民群众共享;实现共享的关键在于党员恪守“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彻底解决一些部门“作用不强等现象。为此,打造服务型党员,必须以“服务职工群众、做职工群众工作”为基本职责,把服务思想贯穿于工作各个环节,认真解决工作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在业余时间作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办实事,关心他人、助人为乐,受到企业以上部门表彰奖励;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在职工群众中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有较高的群众威信,受到矿以上部门表彰奖励。坚决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洪磊：资管行业应从五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

近日在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上,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表示,基金业当前出现结构性失衡问题,资管行业亟需供给侧改革。既要调整《证券法》和《基金法》的立法理念,也要加快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建设,设立以证券投资基金为投资标的的公募牌照,建设从基础资产到集合投资工具再到公募 FOF 的资产管理三层架构体系,并鼓励理财资金、养老金转化为公募 FOF 产品。

洪磊介绍,公募基金已成为普惠金融的典型代表。从投资业绩看,公募基金业绩优秀,为投资者创造了可观的相对回报。公募基金在助力养老金保值增值方面也做出重大贡献。目前公募基金也出现结构性失衡,遭遇发展困境。2012 年以来,银、证、保等各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呈爆发式增长,但截至 2015 年末,其中运作最规范的公募基金规模仅占各类资产管理总规模的 10.1%,约为 8.2 万亿元,公募基金专业能力被边缘化。同时,基金业核心人才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同时,当前大量金融资产缺少长期安全、有效的投资渠道。

洪磊认为,资产管理业呼唤一场全面的供给侧改革:

一是在法律制度方面推动统一立法,建立有助于资本形成和积累的税收体制。调整《证券法》和《基金法》立法理念,《证券法》和《基金法》不能只是某类机构的法律规范,而应该是某类金融服务活动的法律规范。

二是加快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建设。银行理财资金、投连险和万能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居民的养老钱,应当为这部分个人养老需求储备的资金提供安全、有效的制度通道,使其发展为规范的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三是在监管层面鼓励人才资本竞争。应鼓励专业人士、民营机构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设立以证券投资基金为投资标的的公募 2 号牌照,为理财资金公募化提供制度通道,推动代销机构转型为真正的募集机构;推动理财资金转化为公募 FOF 产品,化解非标业务、通道业务潜在风险;推动理财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促进专业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发展。

应研究设置投资顾问牌照,允许符合条件的专业机构和个人从事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应支持符合条件的私募机构申请公募投资顾问牌照,为公募基金和公募 FOF 募集人提供投资决策咨询和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应支持符合条件的专业人士申请个人投顾牌照,可组建小型团队为私募基金提供投资决策咨询和投资组合管理服务。

应建设从基础资产到集合投资工具再到公募 FOF 的资产管理三层架构体系。公募基金应承担起设立和维护稳定的集合投资工具的任务,打造适合不同市场周期的投资工具,形成“春、夏、秋、冬”完整产品链;由公募基金向养老金、理财资金设立的 FOF 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全面开发满足养老、住房、教育等跨周期配置需求的投资产品,通过投资工具层面的分散投资化解非系统性风险,通过公募 FOF 的大类资产配置化解系统性风险。

四是在行业自律层面夯实行业信用,推动规范发展。

五是在基金管理公司层面完善股权治理和激励约束,建设行业信用文化。公募基金管理人应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引入专业人士、核心人员作为基金公司股东,增强他们在公司经营发展中的话语权,优化激励约束机制,实施薪酬延期支付制度,将不低于一定比例的薪酬递延至 3 年内支付,培养投资管理人的风险控制意识,以及对客户和

客户利益的忠诚。(曹秉瑜)

遗失公告

金牛区杰怡美发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编码:510106600702912)